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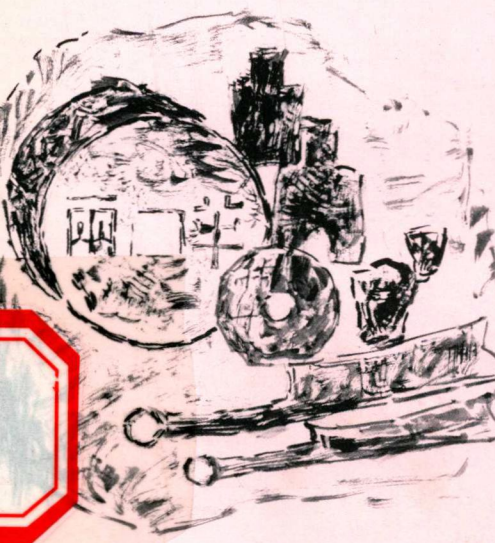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二十一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晋泉史话

朱华
著



山西是我国文物大省,在遗存至今的大量文物中,有一支不可估量的古代货币,是我国文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从商代贝币算起至今也有3600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古货币在我省各地都屡屡出土存世,时代跨度大,数量多,内容十分广泛,实属钱货币、货币史的学科宝贵财富。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1辑)

晋泉史话

朱 华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434-33-x

G·73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中国古钱币学与古钱币学史 ...	(2)
二、山西境内出土古钱币概述	(20)
三、山西铸钱局(监)	(32)
四、山西历史上古钱币学家	(38)
附录:	(38)

引 子

晋,山西省简称。泉,钱币的别名。史书《周礼·地官·泉府》、《周礼·天官·外府》都有记载。《汉书·食货志下》亦载“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意喻钱币通行如地下涌流的泉水,数量多,周转快。就是说在山西境内从商朝贝币至清代末帝宣统(公元 1911 年)三千二百余年历史各个朝代铸造和流通的多种不同形式的古钱币。

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组成的省市之一,资源丰富,工农业、经济非常发达,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她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的古代艺术佳作以及近、现代的光荣革命斗争史。在遗存至今大量文物中,有一支不可估量的古代货币,它是我国文物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是源远流长,若从商代贝币算起至今也有三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古货币在我省各地都屡屡出土存世,时代跨度大,数量多,内容十分广泛,实属钱币学、货币史等学科的宝贵财富。是我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冶炼等诸方面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山西省有 58 个县(市)96 处出土古钱币近 70 万枚。其中由文物考古工作者清理或整理的先秦时期的空首布币、多种不同型制的平首布币、刀币、圜钱等珍贵货币共 30 156 枚又 5.7 斤,出土地点 60 余处,其中大多数属晋与“三晋”钱币。仅以后的方孔圆钱出土地点 23 处,出土数量不低于 8 万枚以上。

一、中国古钱币学与古钱币学史

古钱币，即年代久远铸造和行用的钱币，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之一，为研究历史上各个朝代政治、经济、内外商贸、文化艺术等诸方面提供不可多得的、可靠的、直接的实物资料、是一部历史见证史。我国古钱币历史悠久，而且是一部连绵不断的古钱币史。早在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就以自然海贝壳充当交换手段——实物货币，称贝化(货)。以朋为计算单位，贝十枚为一朋。贝有大有小，大者称虎斑贝[Cypraea Tigris (Linnaeus)]、阿文绶贝[mauritia arabica (linnaeus)]; 小的叫货贝[monetaria moneta (linnaeus)]、拟枣贝[Erroneaerrones (linnaeus)]等，以货贝最常见。以后因自然海贝壳来源匮乏，遂出现骨、石、珧(蚌壳)等人工仿制贝币。

钱，原作泉，取其流通普遍之意。钱，本为古代农具，形似今日铲状，远古时以此作交易。距今两千六百多年前的东周时期，我国已进入金属铸币阶段，以青铜铸造形似钱(铲)的钱币，名曰布币，俗称铲币。春秋末至战国期间各诸侯国纷纷铸造布币、刀币、圜钱以及贵金属铸币——金版(爰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废除其它诸侯国所铸行的钱币，以秦国的圆形方孔“半两”钱通行天下。圆形方孔钱自此始成定制，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民国通宝”钱，历时两千一百余年。后为圆形铜元、银元以及纸币所取代。

我国是世界上铸行钱币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各代皆有铸造，其铸次之繁多，铸量浩繁，品类复杂，由史至今无一统计数字，实难估量。币材也多样，贵金属有金、银，低金属有铜、铁、锡、铅以及铜锡合金，甚至还有用泥烧制。（唐末五代时割据幽州的刘仁恭令百姓行泥钱）从未间断，连绵延续至今。这为我国钱币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币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主要是通过钱币实物的多方面的研究，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文化发展状况。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著作方面。当然著作也会有优劣之分，这就需要依靠客观实际为标尺进行检验。我国钱币学的产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南北朝萧梁时期（502—557）已有《刘氏钱志》和《顾烜钱谱》，惜已失传。《梁书》中只有书名的记载，它是我国最早的钱币学著作。

钱币学虽然有它独立的一面，但是，也离不开其它学科。例如需要研究某一时代钱币的钱币铸造和行用时期，或者是某种钱币是哪一个历史时代的，就必须学习中国历史学。钱币是如何铸造的、币材的金属元素，就得学习冶金史和冶炼工艺以及金相化验等方面的知识。如何识辨古钱币上的钱文书体，就需要学习古文字学和历代书体方面的知识，方可识别先秦时期钱币文字和圆形方孔钱的钱文书体。先秦时期的布币、刀币、圜钱等的面文，大多数都是铸币的地名，就需要学习中国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便于了解古地名，今地望。

钱币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古钱币实物。应从形制、重量、品类、币材、金属元素、金相分析、钱文书体、背面纹饰和文字内容、钱体大小和面额值等方面，有根据的有条不紊地进行研究与探索。

钱币学和考古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考古发掘中古钱币可谓平常之物。出土的古钱币，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窖藏钱币（钱窖）。钱窖的具体地点位置，周围迹象有无古文化遗址以及古墓葬，距现地表深度，出于哪一层文化层，盛装器，（可采集）钱窖结构状况，钱币放置情况，有无绳子穿系，钱币品类、数量、历史时代，出土年、月、日等。需要考虑以上这些方面并作出记录。二是墓葬或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钱币。钱币在墓葬内的具体位置，放于墓主人何处，和其它殉葬品的关系、数量、品类等。有的墓葬虽有随葬品出土，但是，难以为墓葬提供断代的具体依据，随葬品中的古钱币可以起到断代作用。文化遗址内发现古钱币时，需要注意它是属于哪一层文化层，古钱币的周围还包含哪些遗物，出土数量、品类、时代等。

《史记·平准书》和各代史书中《食货志》等所记的钱币部分，它不能算是钱币学，作者对钱币实物并没有作过研究，即使有些对某种钱币的重量和成色有些记载，那只是一种标准而已，有时遇到物价波动、物贵钱轻，往往达不到标准的，也是常见的。西汉初“半两”钱的减重，《平准书》和《食货志》将它形容为榆荚，谓之荚钱，这种荚钱究竟轻到什么程度，则无任何记载，这只有依靠钱币学从实物中解决。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对钱币虽然都有记载，仅仅是对当代铸

钱的一些来龙去脉的记录。

由于种种因素，文字方面的史书尚存有漏载或错误，钱币可以起到弥补和纠正作用。如《辽史》载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寿隆年号，实际上是误载，并无此年号。“寿昌元宝”年号钱的发现，以“寿昌”纠正了“寿隆”之误。

通过钱币实物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探讨当时社会经济制度、商品交换、商贸业以及朝代的兴衰等，从而有助于我们对祖国悠久文明史的了解，增强爱国主义精神。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废北周年幼的静帝，建立了隋朝，结束了分裂三百六十余处的分乱局面。钱币方面也结束了自三国以来紊乱币制，恢复了统一。但仅沿袭汉代五铢钱制，无新创，只是形式上由汉窄缘五铢变为阔缘，面文五字较瘦长，左侧近穿处有一竖画，币材金属配剂铅多于铜，钱色发白，人称白钱。种类仅此一品。因而钱币学无任何成就，只是在《隋书·经籍志》略载《顾烜钱谱》一卷，图一卷而已。

原在隋朝时任太原太守的李渊借助农民起义军势力，反隋攻占长安逼隋末帝杨侑让位，自立唐朝，即唐高祖。建立政权后的第四年即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废以往半两、五铢重量为名的钱币，新铸以宝为钱名的“开元通宝”钱。开元意即开辟新纪元，国家长治久安；通宝就彻底改变以往计重为钱文的币制，通行天下的宝货，故钱文用通宝二字，不但“开辟”了“唐代新纪元”，而且一直“开辟”到民国初年。自唐以后一千余年内历朝各代的钱文多延用某某通宝、元宝或重宝等。近二百九十年和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

世，如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之治”，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开元盛世”。可是唐朝时期的钱币学，并无显著进展，大概是缘于终唐之世，只铸行了一种开元通宝钱，不被人们所注意。唐代钱币学的研究见于著录的只有两部，张说（667—730，即唐高宗乾封二年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生年63岁。）《钱本草》二卷，内容不详。封演《续钱谱》一卷，已失传。所谓续，是指读顾烜的钱谱。据南宋洪遵《泉志》所说，封演对钱币的知识和研究并不广泛也不深入透彻。

唐朝末年，黄巢农民大起义，击垮了唐王朝，而政权却被封建官吏和地方豪强篡夺了。在中华大地上，从南到北各自建立独立王国，并且相互厮杀，成了一个“战马多于耕牛，卒武多于农夫”的纷争的战乱局面。这就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分裂与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各自独霸一方，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因而经济、金融方面也各自铸造自己的钱币。在较短的半个多世纪内钱币铸造工整，品类繁多，币材多样，有铜、铁、铅，甚至以埴土烧制。钱文书体多样，如行、楷、篆、隶体等，且很健美。形制有小平和折十大钱，其中有些钱币尚属少见，稀罕品也不乏有之。五代十国时期繁杂的币制为钱币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张台著的《钱录》一卷，并附图，就是一部很有钱币学价值的著作。内容很丰富，从先秦时期的布、刀、圜钱至楚马殷的天策府宝钱，可谓应有尽有。张氏的钱币学研究是在所见实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钱币学，对有些不易隶定钱文的钱币仍然忠实地作了记述，对汉至隋的各类五铢钱都作出论述。对钱文和钱币的轻重很重视，这是钱币学的主

要的两个方面,对后人研究钱币影响很大,《钱录》多为后人所推崇。《宋史·艺文志四》载有张氏书名。

五代后周时的殿前都检点,领宋州归德(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军节度使,掌有兵权的赵匡胤于公于960年陈桥(今河南省开封市北陈桥镇)发动兵变,即帝位,国号宋。结束了混战割据五十多年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历时三百一十余年的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阶段,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在封建帝制时代皇帝即位或遇有大事,为图吉祥都要新立年号,以图更始,开辟新纪元。宋朝共有十八帝五十七个年号,在大量的钱币中冠以年号的钱币就有四十四个年号钱,占年号总数十分之七点七多,非年号钱四个,未铸钱年号六个,南宋末三个年号(1275—1279)是行用“钱牌”的四年。由此看来,宋朝特别注重年号钱。宋朝钱币无论是数量或是品类都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多的一个朝代,遗存至今的历代古钱币中也是宋钱为多数。宋朝钱币币制复杂,有小钱和大钱,具体的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种钱币。币材多种,铜、铁、金、银皆有。铸造工艺也多精湛,钱文书体各种书法俱有,以及享有盛名的宋徽宗(赵佶)的所谓“铁画银钩”的瘦金体,其钱币艺术可谓空前。在当时社会中人们对钱币的收藏和研究颇为流行,有人自虞夏以来,一无遗者,共收古钱币数十百种。因而我国钱币学的发展在宋朝已达到了顶峰,著述也较多,对以后的影响也很大。主要的有:陶岳:《货泉录》一卷,((《宋史·艺文五》载书名)专记五代各国铸钱本末等。杜鎬:《钱币故事》一卷,((《宋史·艺文二》载书名)《宋史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五

十五·杜鎬》载太宗(赵光义)为西汉赐用黄金事与杜鎬对话。金光裘:《钱宝录》,于公甫:《古今泉货图》一卷,(《宋史·艺文四》载书名)《钱氏钱谱》等。以上部分著作内容不详,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

北宋时期有两部比较重要的钱币学著作,一是董道:《续钱谱》十卷;(《宋史·艺文五》载书名)二是李孝美:《历代钱谱》十卷。这两部著作对以后的钱币学家影响较大,在研究和论述中皆有所引用。

南宋著名钱币学家洪遵(生于1120年,即宋徽宗赵佶宣和二年;卒于1174年,即宋孝宗赵昚淳熙元年。生年54岁)字景严,洪皓仲子,江西鄱阳人。著《泉志》十五卷,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钱币学著作。全书分为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天品、刀布品、外国品、奇品、压胜品共九类。《泉志》对以后的钱币学影响很大,许多钱币学家奉为经典。洪遵曾与宋高宗(赵构)论钱币之利与害,并以复鄱阳永平、永丰两钱监鼓铸。(见《宋史卷三百七十三·列传第一百三十二·洪皓》)南宋孝宗(赵昚)乾道年间(1165—1173),罗泌撰《路史》四十七卷。虽然不是钱币学的专著,但是对后代钱币学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我国现存史志中最早记述先秦时布币资料,如布币的阔广与轻重以及布币的面文字形结构等都记录与描述。特别是书中的“国名纪”八卷,为后代的钱币学家考证布币地名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定国号为元,并于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全国,建都大都(今北京市)。自世祖定国号起凡十一帝,九十八年。元朝在建国前

后都曾行用铜钱,但是,早在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时曾诏印造交钞,至世祖中统元年(1260)七月下诏造中统元宝交钞,十月初始行中统宝钞。元朝人重钞轻钱,所以元朝钱币学不甚发达,而纸币方面有费著的《楮币谱》书中附有“钱引”的格式。武祺的《宝钞通考》。

明太祖朱元璋是反元起义军的一支,于公元1368年推翻元朝统治,建都南京(今江苏省南京市)国号明,年号洪武。朱元璋四子,成祖(朱棣)初封燕王,镇守北平(今北京市),于惠帝(朱允文)建文元年(1399)起兵,四年破京师(今江苏省南京市)并杀侄,夺取帝位,年号永乐。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次年正月改北京为京师(今北京市),凡十六帝十七个年号,(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四年因“土木之变”,后于代宗朱祁钰景泰七年复位。故先后有两个年号)共二百七十余年。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以后则钱钞并行。明朝铸行的钱币,皆为年号钱,由洪武至崇祯十七个年号,只铸十个年号钱。朱元璋立国前于龙凤二年(1356)攻下集庆(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吴国公时已铸“大中通宝”钱。明朝钱币面文除年号二字外,悉用通宝,不用元宝。明朝避讳“元”字,一讳开国皇帝名字中有元字,二讳被推翻元朝的“元”字,故忌之。明通宝年号钱其制有五等:“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小平钱,背文多纪地或纪值。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三月立钞法,并罢宝源局铸钱。诏中书省印造“大明通行宝钞”纸币,终明一代,宝钞只有一种,均用洪武年号。八年的“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洪

武二十二年(1389)“更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明朝虽然是钱钞兼行,实际上仍沿元制重钞轻钱,因而钱币学在明朝没有什么发展,也无像样的钱币学著作。永乐、洪熙年间(1403—1425)的《董通钱谱》一卷。简单不详细,对许多钱币都作了错误的解释。如:西汉初的榆荚半两钱识认为当百钱;北宋徽宗(赵佶)的圣宋元宝识认为北宋太祖(赵匡胤)铸的钱。甚至将他当朝朱元璋称帝前在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吴国公时铸的大中通宝钱误认为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年的铸币等等。还有些钱币方面的著作如陆深:《宝货志》、《钱谱》,罗汝芳:《明通宝义》、《广通宝义》,郭子章:《泉史》等,惜已失传。

我国东北地区女真族中贵族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太祖)于公元1616年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年号天命。天命十一年(1626)第八子皇太极,即清太宗继位,年号天聪。天聪十年(1636)改金为清,称皇帝,年号崇德。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继皇帝位,年号顺治。次年(1644)挺进山海关,定都北京。20世纪初,辛亥革命于1911年将清末帝溥仪请出皇室。自此,我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宣告结束。清朝自入关后至溥仪宣统三年,二百六十余年共十帝十一个年号。(咸丰十一年七月穆宗载淳即位改元“祺祥”,十一月再改元同治,故此多一年号)。

清太祖努尔哈赤立国起十二年,无一不鼓铸钱币,计十三个品类,皆为年号钱。面文由年号与通宝四字组成,初用满文,自顺治始统用汉文。咸(丰)、同(治)、光(绪)三帝的钱除通宝外,在大额钱币上新创重宝、元宝。重宝有:当四、当

五、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元宝有：当百、当二百、当五百、当千，以区别通宝小平钱。（通宝铁钱和新疆部分局也铸有当十、当二十、当五十、一百钱）背文，初期效仿明制，用汉文纪铸钱局名和币值，不久即改为满文和满、汉文纪局名。自世宗雍正始至末帝溥仪宣统均为满文纪局名，大钱用汉文纪值。从高宗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新疆叶尔羌局始铸的乾隆通宝钱，背面穿左为满文，穿右为维吾尔文“叶尔羌”，满、回二种文。以红铜铸造，俗称“红钱”。此钱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帝皆有鼓铸。乾隆五十八年（1793）允西藏开铸银元，面汉文“乾隆宝藏”，边郭添铸汉文纪年“五十八年”四字与圆珠纹相连，背用唐古忒字亦为“乾隆宝藏”四字。

清朝钱币币材品种较多，按清初规定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以后无定制，铁、银、红铜（紫铜）、黄铜，末帝时还有镍等皆有。

清朝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制社会的最后一王朝，由17世纪中叶开始统领华夏民族到后期进入19世纪至20世纪初已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国内时有反封建和皇族之间革新与守旧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社会局势不断地动荡，而反映这种动荡最敏感的当属钱币的良、劣和币值的大小。自世祖顺治定鼎燕京始，大开铸局，至宣宗道光六帝时期所铸钱币多阔缘厚重，铸工精湛，形体端正，钱文庄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三十余年间国富民殷，钱币铸量由康熙元年（1662）的二万九千多万至雍正十年（1732）增至六万八千四百三十六万二千多。康、雍两朝只有七十余

年，而钱币铸造雍正较康熙就激增了三倍，这在二百七十年之前的社会条件下实属不易。从咸丰至末帝溥仪之间，不仅钱体轻薄，且出现大面额钱币，以及铸造了大量铁钱。从咸丰至光绪四帝时由于外有帝国主义入侵，掠夺财富，内有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财政经济急剧紧张，行成了币制的异常紊乱，当百当千大钱、银两、钱钞、铜元、银元等等纷至沓来。

清朝和我国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都存在着立国、兴盛、衰亡的阶段，钱币的兴革和时代兴衰的步伐是一致的。以钱币实物为研究基础的钱币学也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之一，他只能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而更改。清朝是我国钱币学由史以来的发展时期，在二百六十余年内曾涌现出专家学者、收藏家大约六十五位，钱谱著录约六十六部，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顺治至乾隆初是清朝立国和振兴时期，钱币学是处于草创期，虽有成果，但不太成熟。如顺治时朱多烺：《古今钱谱》，康熙雍正间朱枫：《古今待问录》、乾隆初张端木：《钱录》等，多属重复或稍有补充，无甚新的见地。

从乾隆十五年（1750）至嘉庆道光年间，由于出土钱币日益增多，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钱币学曾盛极一时，此期间学者专家约二十余位，著录约三十余部。其中有典型性的代表作品有：

江德量：《钱谱》二十四卷。书中有外国钱币一卷，这是我国收录外币的第一部著作。江氏将钱币与农具的关系在书中作了阐述，先秦时期铸行的布币源于农具“钱”的看法

是正确的。

翁树培：《古泉汇考》八卷。作者以数十年的实践撰写了几十万字的这部著作。内容丰富，著录先秦至明代的钱币，并将史志上有关钱币的文献摘抄于书中。根据自己在钱币实物的研究中对钱币版别作出分辨。钱币学界将该书认为是钱币学的总汇，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是清朝钱币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将我国钱币学推向新高潮。

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十六卷。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作者依据出土钱币进行研究，所阐述的论断很有见地，不愧为钱币学的名著。

倪模：《古今钱略》三十四卷。分钱图和文字两部分，书中资料性较多，如清初制钱方面的钱价、私铸私销、铜价等，还有楮币源流，历代谱录和制钱等。书中还著录许多外国钱币，如朝鲜、西班牙、美国、德国、葡萄牙、荷兰、帝俄等国。

蔡云：《癖谈》六卷。图与说兼有，有布币、刀币、圜钱、圆钱，重于考证，他将钱币实物结合史志记载进行论证。西汉吕后和武帝的“五分”、“三分”半两钱不以大小轻重而以十二铢（即半两）比重分析阐明，（即半两的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很有创见。

刘喜海：《古泉苑》，作者是古钱币收藏家，约有四十年之久的收藏史。书中收有钱币四千六百多种，还有钱范图数十幅，这在以往钱谱著录中很少见。

马昂：《货币文字考》四卷。这是一部对先秦布币、刀币、圜钱面文考订之作，完全是钱币学中研究的课题之一。先秦币文的隶定非常重要，是古文学之一，字形书体是我国书法